

燕京鄉土記

邓云乡著

Xc25/14

邓云乡 著

燕京鄉土記

葉稚陶 題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刘东远
封面设计：王沙城

燕京乡土记

邓云乡著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祝桥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6.5 插页 6 字数 348,000

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—3,100册

书号：17077·8001

定价：3.45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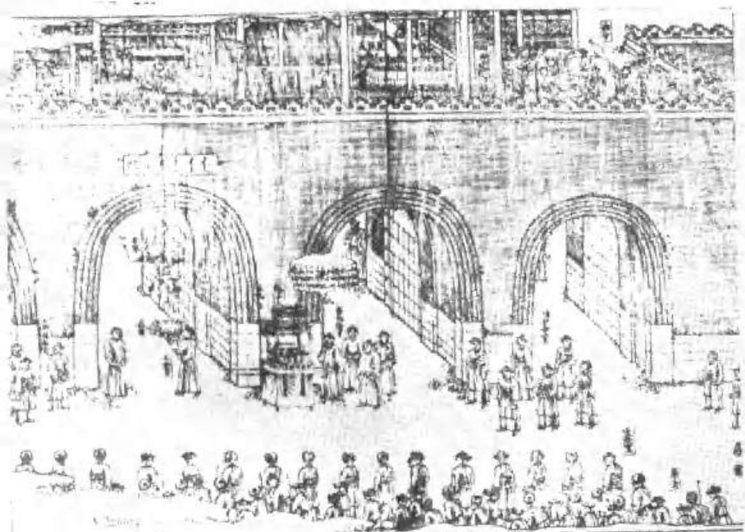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记述古老都城北京旧时乡土民俗的专著。

全书按岁时风物、胜迹风景、市廛风俗、饮食风尚四个部分，分别就京城习俗的各个方面，联系历史变迁和生活经历，结合忆旧和文献材料，运用富有情致的小品笔调，作了很有趣味的叙述。

该书出自民俗学专家之手，既是一种不可多得的乡土民俗读物，又是一种文艺笔记作品结集；知识丰富，文笔隽永，适宜民俗历史研究、旅游、文艺爱好者和一般读者阅读。

《唐土名胜图会》中绘制之十九世纪末正阳门图，包括门楼、瓮城、正阳桥、五牌楼



《唐土名胜图会》中所绘之《天安门颁诏图》

七十年前正阳门(简称前门)未拆除瓮城时的照片(邓之诚收藏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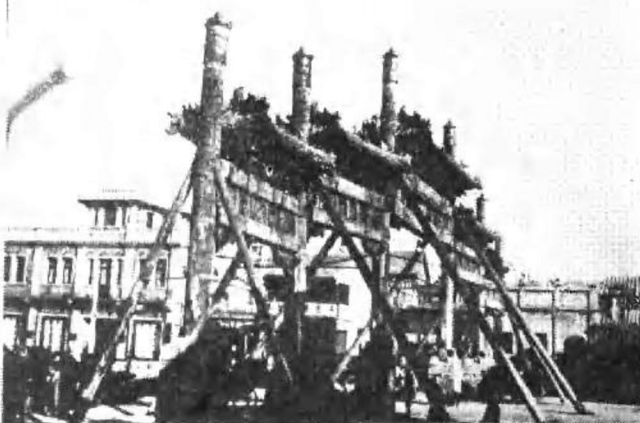


已故史学家邓文如(之诚)
先生题照片之手迹



旧时故宫角楼水榭之风光

民國四年六月間前門兩旁門
洞以前出至門外須分幾路趨
往東南向有行折而出前門五
分出東西兩城門以達楊橋行
各棚橋每車至一小時時止
不復此照片是未開前門前
時攝今願刻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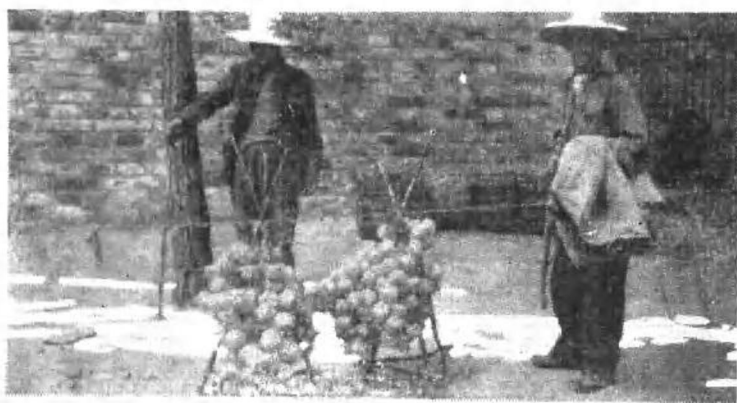


五十年前之前門五牌樓

五十年前北池
子北口夏日街头之
槐荫，见《燕山花信
谱·槐花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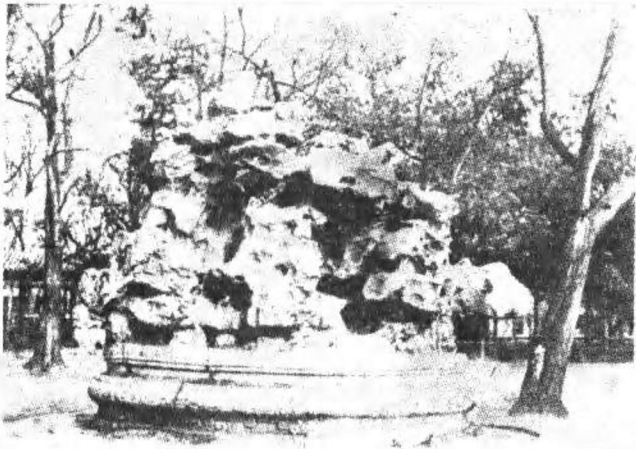


二三十年代间刻竹名家张志
鱼等所刻之沙地留青花卉扇股，
见《小院乘凉时·芭蕉扇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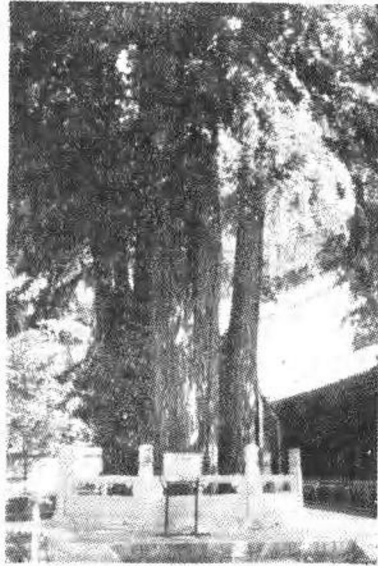


卖蛴螬的汉子，见
《七月清韵·蛴螬》

青云片太湖石,见《稷园花
事·中山公园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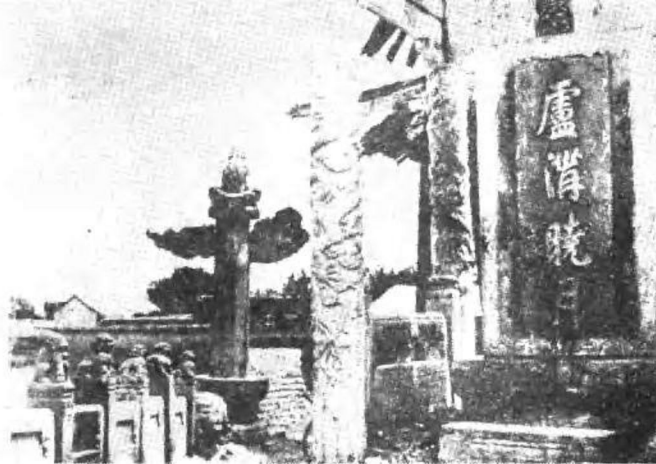
潭柘寺千年古银杏, 乾
隆时称为“帝王树”, 见《银杏
奇观·潭柘寺》



天坛古树祈年殿, 见《坛宇柏森森·祈年殿》



有华表龙柱时卢沟桥之“卢沟晓月”碑，见《卢沟千古月·卢沟桥》



三十年代时白塔寺之白塔，见《白塔怀古·白塔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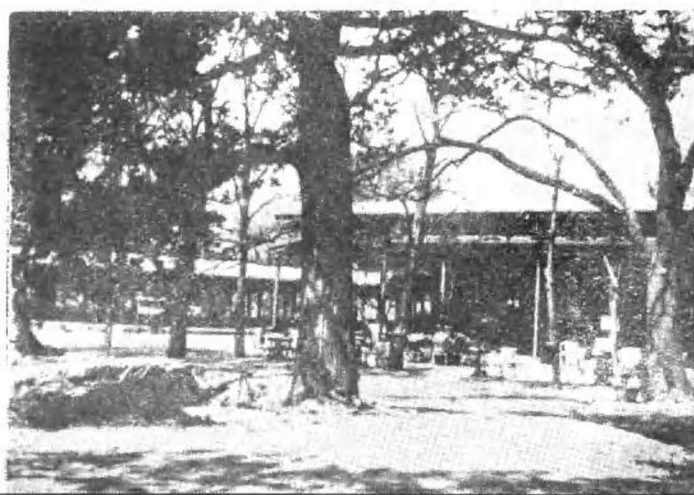
大高殿前之牌楼，东西各一，对门一座，图中匾为“弘佑天民”，见《禁城记趣·角楼蛙声》

见《禁城记趣·景山》
景山东麓崇祯帝朱由检吊死处，



雍和宫跳步札(亦称“打鬼”),由喇嘛僧所扮之骷髅像,《打鬼传奇·雍和宫》

农事试验场,又名万牲园,俗称三贝子花园,其中之顺风堂茶座,见《西郊路上·贝子园》





七十年前北京之
骡拉轿车, 见《鞭影小
骡车·骡车》



古城一角之骆驼,
驮煤、驮石灰之主要
运输者, 见《冬煤与
骆驼·驮煤》



三十年代时护国寺庙门,
见《庙市商情·庙会》



金鳌玉蜆桥西面之金鳌牌楼，见《牌楼街市变迁多·金鳌玉蜆》

一九〇〇年前之东单牌楼，庚子时烧毁，见《牌楼街市变迁多·东单》



旧时德胜门积水潭汇通寺野趣，见《闲话玉壶冰·冰窖》

序 一

顾颉刚

余因挚交瓜蒂庵主谢国桢教授之介，获识邓君云乡。云乡熟掌故，擅诗文，谈艺论学，滔滔不绝，颇堪钦敬。一日持近著《燕京乡土记》一稿示读。皆旧时北京之习俗风尚，颇多异闻。在游观饮食之中，皆存历史演变之迹。昔我家颉刚教授在广州中山大学提倡民俗之研究，研究关于民间流传之信仰、习俗、故事、歌谣、谚语等，尝主编《民俗周刊》，是亦专门之学，岂可以识小视之。余于三十年代间曾旅居燕京者八年，素性不好游赏而又善忘，今读云乡之稿，浑然如温旧梦矣。

尝阅前人日记，往往载厂甸之盛，余曾两度游观：从和平门起至南新华街，均搭盖席篷，遍悬名人字画、楹联、屏条、中堂，游人之多，挤扎不能驻立。蹶足眺望，大名家，多伪作，近人者尚有佳品，价亦不廉，非学子可以染指。南行至海王村，则书摊林立，游人亦多，然尚可在摊旁捡阅，偶得异本，归与同好相赏，殊足乐也。今观云乡稿中所记，情亦历历，为之神往。

又忆一九三四年，其时国民党政府废止阴历。阴历元旦

凡学校机关均必须照常上班，然于腊鼓催年，农历除夕之际，家家户户无不置酒欢饮；商店照例休息，厂甸仍极热闹，即白云观之“燕九”盛日，亦仍车毂喧阗，不殊曩昔焉。由此可见，风俗之移易，似不宜强加变革。况风俗之中，有善有陋，善者宜保存之，发扬之；陋者宜剔除之，改变之。“但开风气不为师”，其取舍之际，要在深心者之远瞻熟虑，因势利导，保存发扬其善者，为民族传统之继承；剔除改变其陋者，为民族健康之前进；二者至宜并重，固不能轻率主观，以个人之好恶而偏废之也。建国以来，重视春节，亦所以重视农业劳动，重视历史传统，顺乎民情，适乎天时，岂不懿欤？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其时令一类，收书仅二部，而入存目者十一部，可谓寥寥。嗣后著者稍多，亦不过约二十部。云乡此书，可于此类占一席矣。衰年笔墨荒伦，不足阐扬于万一，率记数语，聊存鸿雪。

序 二

周汝昌

明人刘、于二公的《帝京景物略》，真是一部奇书，每一循诵，辄为击节叫绝。——然而高兴之余，却又总带有几分怅惘之感，因为在我寡陋的印象中，似乎数百年间，竟无一人一书堪称继武，在他们之后，拖下了这么大的一片大空白。这难道不让人沉思而慨然吗？多年以来，此种感慨日积日深，——不想今日要为云乡兄的《燕京乡土记》作序，我心喜幸，岂易宣喻哉！

乡土记有甚可读？有何价值？我不想在此佳构前面回答这种八股题，作此死文章。汉人作赋的，先讲“三都”、“两京”；三国诗人，也有帝京之篇。看来古人所以重视“皇州”、“帝里”，不一定只是为它是“天子脚下”。不论什么时代，一国的首都总有巨大的代表性。燕都的代表性，远的可以上溯到周武王分封，近的，也可以从辽金说起——这“近”，也就有七八百年呢！这期间，人民亿众，歌哭于斯，作息于斯，蕃衍于斯，生死于斯，要包涵着多么广阔深厚的生活经验、文化内容，恐怕不是“计算机”所能轻易显示出答案来的。我们中华民族，

就在这样的土壤上，创造积累出一种极其独特而美妙的文化；这一文化的表现形式，不只是存在于象有些人盯住的“缥緗卷轴”之间，却是更丰富更迷人地存在于“乡土”之际。这一点，往往为人忽略。忽略的原因，我认为是它太神奇而又太平凡了，于是人们如鱼在水，日处其中，习而与之化；于是只见其“平凡”、而忘其神奇，而平凡的东西还值得留心与作记吗？这也许就是刘、于二公之所以可贵。我常常这样思忖。

“乡土”到底是什么？稍稍长言，或者说成乡风土俗。乡风土俗，岂不“土”气乎？仰慕“洋”风的，自然避席而走。但因沾了“帝京”的光，或许就还能垂顾一眼，也是说不定的。其实，“帝京”的实体，也仍然是一个人民聚落的“大型”物罢了。一个小小聚落的“乡土”，却也是很值得为之作“记”的呢？

我打一个比方。譬如这“庙”之一物，今天一提起它，想的大约只是一个“迷信象征”。事实上并不是这么简单的“认识论”所能理解说明的。如果他乍听庙和“社会”密切相关，会惊骇诧异或嘲骂其“荒谬”、“错误”。因为他不知道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，我们的“老祖宗”们，凡是聚落之点，必先有一“社”（也许设在一株古树之下），群众有事——祭祀的，岁时的，庆吊的，娱乐的，商议的，宣传的……都以此“社”为“会”众之所。从这里发生出“一系列”的文化活动形式。后来的庙，就是“社”的变相遗型（众庙之一的“原始体”叫土地祠，就是“社”了）。庙的作用，远不只是“烧香磕头”一类。应当想到：建筑、雕塑、壁画种种艺术，都从此地生长发展。唱一台戏，名曰“敬神”，其实“娱人”，（“心到神知，上供人吃”的俗谚，深通此理了！）而戏台总是在庙前头的。所谓“庙会”，其实是“农贸市场”和“节日文艺演出”的结合体！所以鲁迅先生早就指

出,这是中国农村人民一年一度的唯一的一种自创娱乐形式,把它当作“迷信”反掉了,则农民们连这么一点快乐也就没有了!——讲“乡土”,其中必有与“庙”相关的事情,这是我敢“保证”的。这些事,难道不值得我们思索一下吗?

我们常说“人民的生活”这句话。其内涵自然有科学表述,今不多及;然而假使人民的生活当中不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一重要方面,那么这个民族(伟大的民族啊!)还有什么“意味”可言呢?这个民族有他自己的文化历史,有他自己的乡风土俗,这如不是一个民族的一种标志,那什么还是呢?

历史的时间长河是望不到尽头的,时代要前进,科技要发展,文明要进化,社会要变迁……。但不管怎么进展变化,中华民族的根本质体与精神是不会变“土”为“洋”的。以此之故,后人一定要了解先人的“乡土”,知道他们是怎样生活、为什么如此生活的深刻道理,才能够增长智慧,更为爱惜自己民族的极其宝贵的文化财富,对于“古今中外”的关系,才能够认识得更正确,取舍得更精当,而不致迷乱失路,不知所归。

如此看来,为燕京之乡土作记,所系实非细小。以“茶余酒后,谈助可资”的眼光来对待它,岂不浅乎视之了?

开头我提《帝京景物略》,此书确实不凡。但它是以“景物”为主眼,除“春场”等个别条目,记“乡土”的实在不够丰富。如今云乡兄这部新书,大大弥补了前人的阙略,长期的空白,使得我们不再兴惘然之慨叹,其于后来,实为厚惠,不独象我这样的一个人的受赐良多而已也。

云乡兄的文笔亦佳,使刘、于二公见之,或亦当把臂入林。这也是不可不表的。

我草此序,极为匆促,不及兼作题咏,今引前年题他的《鲁